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调和思想

——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张卫波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衷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关键词: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调和思想;孔子评价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4)04-0078-04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冲突剧烈、文化流派纷呈的时代。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里,东方文化派首先是以文化调和者的身份出现的。东方文化派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他们对孔子的基本态度,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调和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一、调和中西 折衷新旧

“东方文化派”一词产生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中,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1923年6月,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较早使用“东方文化派”一词,认为东方文化派是指竭力拥护“宗法社会的文化”的人^[1]。1923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对东方文化派及其思想特征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东方文化派内可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勱和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士钊)为一系,其中“梁启超一系,底子虽然是中国思想,面子却满涂西洋色彩,他们讲玄学。……梁漱溟一系,底子虽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国思想,面子上却说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章行严一系,底子亦是中国思想,……面子上前些时却亦花花絮絮涂着西洋色彩,已取得欧化通的头衔。”^[2]之后,东方文化派的涵盖范围继续扩大,包括杜亚泉、钱智修、陈嘉、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梁漱溟、吴宓、梅光迪等人,泛指那些不赞同新文化运动,要求保守传统文化,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的知识分子。

虽然,东方文化派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相互之间也比较独立,但是,在文化道路的选择上却有共同的主张,即文化革新问题上,主张循序渐进;文化道路选择上,主张调和中西、折衷新旧。

第一,主张保存和改造传统文化。五四时期,军阀当政,守旧思想弥漫,复辟暗潮涌动。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胡适、

吴虞、钱玄同等新文化知识分子以涤荡专制余威,宣扬民主、科学为主旨,对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批判,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纲常礼教,是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是吃人的礼教,进而主张打破孔子偶像,废除旧道德。钱玄同甚至偏激地认为“唯有将中国书籍束之高阁”,和“废灭汉文”,才能避免传统文化的毒害。^[3]新文化知识分子用激烈的言词批判传统,打破了旧思想的权威,为新思想的传播廓清了道路,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东方文化派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先民长期积累的结果,对于“保守固有之文明”,应该持一种“积极之肯定对答”的态度,而不是弃之如稻草。^[4]考虑到“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之文明,取他人所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5]并且固有文化是新文化形成的基础,“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他们认为,传统只可保存和改造,而不可摈弃,指出“决不可以风俗、制度、仪节有当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体,攻击之、屏弃之,盖如是,则世界灭而人道熄矣。”^[6]在他们看来,对固有之道德学问,可资为本原者,不知所以保存而疏导之,“是忘本也。”^[7]东方文化派关于保守传统文化理由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特征。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优越性的过度强调,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淡化,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合理性,使他们不自觉的处于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对立的地位。

第二,提倡中西调和。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关联,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思想界争论的重要内容。在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新文化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坚定批判者,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积极提倡者。他们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之差异,两者在本质上无法调和,“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

收稿日期:2003-12-31

作者简介:张卫波(1975—),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

和牵就的。……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不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8]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中西文化之间在根本上相矛盾,只能选择其一作为发展方向,“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9]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东方文化派并不相信中西文化不可调和。相反他们认为中西文化互为异质,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救济,即所谓“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10]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顽固保守固然不可取,但是舍己求人也同样不必提倡,唯有取长补短,融汇中西,才能适应时代之发展,指出“现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效仿而已”。^[11]他们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点,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就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12]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批判西方文化、赞扬东方文化的新动向,即“现今西方思想界已彰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的人生态度”。^[13]他们主张用中国文化救济西方文化,并认为未来世界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指出“东方文化(此亦单就中国言)在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其根柢,最能运用发展者也。……东方文化(此略兼印度言)在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而尤以世界主义为其归宿,故东方文化则可为将来之世界文化也”^[14]。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取长补短、融汇中西,从而达到复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是东方文化派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种文化观具有开新的一面,也有守旧的一面,两者的并存反映了东方文化派思想的复杂性。

第三,主张新旧折中。新旧问题是五四时期思想界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由于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新与旧的内涵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并且新与旧的内涵存在根本上互相违背,“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无不根据于人权平等之说,……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因此,他们反对新旧折衷,认为新与旧“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15]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东方文化派认为,新与旧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不仅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还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即“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已有的,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16]同时,他们认为新旧只是时间概念,在本质上并没有优

劣之分,“新旧不过时期之代谢,方式之迁换,苟其质量之不变,自无地位之轩輊,非可谓旧者常胜于新者,亦不可谓新者常优于旧者也。”^[15]因此之故,他们反对将新旧截然对立,认为守旧和立新并不矛盾,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16]“保旧迎新”是东方文化派在新旧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和 New Culture Movement 知识分子“破旧立新”的新旧观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东方文化派注意到了新旧之间的延续性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否认传统意义上的旧文化和外来的资本主义新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别,则使他们陷于理论和实践相矛盾的境地,即“保旧”和“迎新”在理论上讲得通,而在事实上两者是不可能并存的。

五四时期,调和思想十分盛行,东方文化派的调和中西、折中新旧的主张可以说是当时调和思想的一个代表。

二、昌明孔学 反对国教

东方文化派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在对孔子的评价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现出明显的调和特征。一方面,他们对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评价很高,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反对文化上的排外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和西方其它哲人、圣人一样都是伟大的人物,唯有用新的眼光审视、诠释孔子思想,使之走向世界,孔子的思想才会真正的发扬光大。

其一,主张保存和改造孔子思想。五四时期,“批孔”的呼声很高,孔子几乎成了守旧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文化派反潮流而动,对孔子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积极进步内容进行了深入发掘。考察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他们把孔子思想视为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结晶,认为“孔子毕生所述,皆道德之教训,其言实为数千年中国立国道德之大原。……中国数千年文明之结晶,即为孔教”,^[4]在他们看来,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思想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代 表,指出“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试将中国史与泰西史比较,苟使无孔子其人者坐镇其间,则吾史殆黯然无色,且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控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17]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孔子起着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18]既然在他们心目中,孔子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是中传统文化的代表,因此,他们主张保存和维持孔子思想,认为这是国势日微情况下延续中国文化的关键,指出“盖孔教为中国固有文明之结晶,而此结晶,近为西洋恶思想攻破。苟中国国民具自觉之力,必当保存之维持之。”^[14]为了保存和复兴孔子的思想,东方文化派呼吁用新的眼光审视孔子,并主张用西方文化对孔子思想进行现代诠释。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与西方一些哲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只要将两者融会贯通,就可以创造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文化,指出“孔孟人本主

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计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改。”^[16]通过对孔子思想进行现代诠释,来保存和复兴孔子思想,是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文化主张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这一思想,既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思想的延续,又反映了欧战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是现代新儒学的思想源流之一。

其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为了保存孔子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为了恢复孔子的权威,发起了国教运动,要求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围绕着宪法草案的起草,思想界对孔教定国教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新青年》、《东方杂志》、《申报》等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为此也刊登很多有关孔教问题的文章。应该说,孔教问题是五四时期,思想界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对于“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新文化知识分子是明确反对的。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是一种陈旧的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定“孔教为国教”在根本上与民主政治所宣扬的“信仰自由”相违背,因此,定孔教为国教非但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是专制复辟的一种先兆。在国教问题上,东方文化派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一样,也明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是,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是从“昌明孔学”的角度来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进行批驳的。他们认为“昌明国学,与世界之文明,融洽调剂,诚为吾国民之天职。若欲取历圣相传之道义学术,视为宗教,以欲耶、佛、回相对峙,就政策言之,或足以取悦于闭关时代所留遗少数老朽顽固者之心,而于满蒙回藏之信仰,已不无关系;若就国家社会进步发展言之,则仅能于现在之动机上,稍与以障碍,俾发生一种之反动,以酿成将来决破樊篱时之大冲突而已”。^[18]在他们看来,孔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定孔教为国教不仅不符合孔子思想的实际,而且也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指出“若设为国教,则必有形式上之约束,而失因时救济之妙用。且他人方离宗教之羁缚,而进于理想知自由,吾乃从理想之自由,而趋于宗教之羁缚。闭遏智识,阻碍进步,莫甚于此,殊未见其可也”。^[19]他们认为,孔教的“教”字“非宗教之教,即孔子所言之道理耳”,^[20]况且宗教式微趋势不可阻挡,“宗教之力,已不足恃。且宗教必不脱迷信,如耶教三位一体,童女诞生之类,实与科学事实不合,难以强人遵从。”因此,没必要定孔教为国教,“即不定孔教为国教,则可永远不用国教,各教平视,悉听其自由传布。孔教之地位,亦不必强为辩定。”^[6]倘若强

定孔教为国教,不仅无足为孔子增光,而且还有损孔子的形象,无异于“画蛇添足”。^[4]东方文化派对“定孔教为国教”观点的批判,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这使一些主张尊孔的人也加入了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行列,大大削弱了孔教派的实力。五四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正面批判定孔教为国教,东方文化派从昌明孔学的角度批判国教主张。他们互相呼应,共同批判定孔教为国教主张,使孔教运动的影响日益减少。

其三,主张历史的看待孔子的思想,反对激烈批孔。他们认为,对于孔子固然不能以教主视之,但也不能视其为近世所有问题的病源,更不能把历史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结到孔子身上。吴宓就反对时人以恶纳妾而辟孔,他说:“孔子之时,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尚未创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敌体为教,今以恶纳妾而排击孔子,岂可乎?……又如仁义忠信,慈惠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会不可须臾离者也”。^[4]柳诒徵则反对将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弊端归咎于孔子,他说:“无论孔子不独尊君,且不主张专制,第就孔子时代言之,桀、纣、幽、厉,皆先于孔子者也,是果有何人学说演成?稍治历史,即知此说之不能成立。……科举之为善制与不,当别讨论。今第为不良之制,是亦科举自身之害,非孔子之害也。以利禄诱人,而假途于孔子之书,与假途于他人之书,其性质相等。”^[20]等等。尽管东方文化派对孔子思想的辩护,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不尽客观,但是,应该承认他们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的态度还是值得借鉴的。在尊孔思想和批孔思想严重对峙情况下,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孔子的思想、评价孔子的功过正是当时思想界所缺乏的。

东方文化派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对孔教问题的态度,反映的是一种调和主义的文化观。它在主张保存传统、昌明孔教的同时,又提倡学习西方,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充分体现了其集守旧和开新一身的复杂性。和孔教派的思想相比较,东方文化派在评价传统文化和孔子时显得更加理性客观,视野也更加开阔;推崇传统并不像孔教派那样极端和流于感性,而是在一战后西方文化受挫的大形势下,以西方的柏格森或白壁德哲学为理论依据,对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做出的一种新的阐释。但是,应该看到,东方文化派缺乏对权威进行批判的足够勇气和精神;仍然没有摆脱以圣人来看待孔子的窠臼,尤其没有看到孔子学说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落后于时代的東西需要批判。这正是他们与新文化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孔子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也是他们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互相争论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A]. 瞿秋白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15,22.
- [2]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A].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C].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73.
- [3]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 新青年.第4卷,1918,(4).
- [4] 张东蓀.予之孔教观[A].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C].上海:经世文社,1914. .11, 8-9,11.
- [5] 伦父(杜亚泉).现代文明之弱点[J]. 东方杂志:第9卷,1913,(11).
- [6]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 学衡,1922,(4).
- [7] 章行严(士钊).新时代之青年[J]. 东方杂志:第16卷,1919,(11).
- [8]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 新青年.第5卷,1918,(5).
- [9]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J]. 新青年.第3卷,1917,(1).
- [10] 伦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 东方杂志.第13卷,1916,(10).
- [11] 伦父(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J]. 东方杂志:第16卷,1919,(9).
- [1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 郑大华等.孔子学说的重光—梁漱溟新儒学论著辑要[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35,98.
- [13]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A]. 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1989. 281-294.
- [14] 汪叔潜.新旧问题[J]. 青年杂志.第1卷,1915,(1).
- [15] 绍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J]. 学衡,1922,(4).
- [16] 章行严(士钊).新时代之青年[J]. 东方杂志.第16卷,1919,(11).
- [17] 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 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A]. 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67-169.
- [18] 伦父(杜亚泉).精神救国论续一[J]. 东方杂志:第10卷,1913,(2).
- [19] 伦父(杜亚泉).国民今后之道德[J]. 东方杂志:第10卷,1913,(5).
- [20] 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J]. 学衡,1922(3).

On the Consonance Concept of the School of Orient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ZHANG Wei-bo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4th Movement, when the intellectuals were locked in the hot arguments about culture selection and the comments on Confucius, the school of Orient Culture also took part in the discussion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school in this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rgument. On one hand, they advocate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s and the flourish of Confucian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gainst the stubborn and narrow-minded attitudes towards old fashion; they advocate the mixture of East and West; they criticize the deifying of Confucius. All these opinion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eties at that time. The mixture of East and West and the mediate of the new and the old ar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Orient Culture. This feature formed in the intense conflict between new and old ideas shows the difficulty of Culture Selection at the end of 1910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May 4th 1919 movement; School of Orient culture; Consonance thought and comments on Confucius.